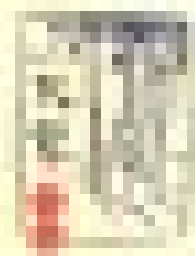




祝勇·主编

萧乾

古吴轩出版社



卷之二十一

前

乾

祝勇·主编

大家
文丛

萧

乾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乾/萧乾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9

(大家文丛)

ISBN 7-80574-852-7

I. 萧… II. 萧…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84668号

主 编: 祝 勇

编 委: 鄂 力 戴 彤 谭宗远

策 划: 施曙华

责任编辑: 侯辛华

装帧设计: 周 晨

责任校对: 冷惠华

沈家山

书 名: 萧 乾

著 者: 萧 乾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33679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60 1/16

印 张: 12.125 插 页: 1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852-7/G · 227

定 价: 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祝 勇

这套书的编辑完全出于一次偶然的闪念。平时不去想它，是因为它看上去不可能，只有两类人富于天真的异想，而从来不计工本——皇帝，和孩子。我有些不自量力，但这个想法令我兴奋。从苏州刚刚回到北京家里，老施一个电话追来，我们都已情不自禁，沉浸在工作状态中。

最初的想法是从老一代学人艺术家开始的。他们活得真是安静，年轻人学不来。杨宪益先生的口头语：“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大的事情，他都要以这句话做总结。写作出版，功名利禄，真的是件小事。他们不愿张罗。旧作断版，不再重印；新作写成，往抽屉里一扔，了事。报纸编辑来约稿，就随手把原稿给他们。杨先生写作从来不留底稿，编他的书，有点像在考古。

是举个例子。别人的状况大抵如此。我是天生的好事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想编一套规模大一点的书，囊括老人们的作品，不为他们，为读者——至少，为我自己吧。老人的东西，学不来，但至少应该知道，有这样一批人，这样的想法。像车前子写张竹汀先生：“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有热血和最有理想的一代人，也是最受磨难的一代。国家，艺术，在老人的心目中，像吃饭时拿在手上的一双筷子一样自然。”他们将告诉我们什么呢？

几个月中，我卷入所有的编辑事务中。有的老人为我提供了他以前从未刊过的作品，有的则把全部未结集的新作交到我的手上。纸张、信件、照片、电子邮件、电话、复印、核对、编目，翻来覆去，颠三倒四，一塌糊涂。我为此感到荣耀。仿佛目睹了一场下了一百年的雪，一片一片，满满的将我覆盖。

书稿的内容，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主题性的，至少要展现一位作者最熟悉的方面。又觉得，中年人、年轻人也可以收入。年龄不是标准，境界才是。一卷卷编下去，卷帙浩繁，像一次编辑的远行，或者说，一次大规模的“扫荡”。那样，不就是一部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史吗？我不敢想。一点点做就是了。一个富于野心的编者，遇到一家富于野心的出版社，事情就弄成这样。

这个项目可能持续若干年，将分辑陆续推出。我们的工作需从每一张纸片开始，循着字迹的线索，潜入那庞大的、无边的世界中去。

2004年7月

目 录

大
家
文
丛



萧
乾

·鼓声	1
·终身大事	5
·在酒楼上	20
·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22
·改正之后	34
·在歌声中回忆	56
·北京城杂忆	76
·《杂忆》的原旨	100
·“文革”杂忆	103
·透过活物看人生	114
·我的医药哲学	130

·一对老人,两个车间	134
·老北京的小胡同	137
·看待二十一世纪中国	140
·梦游“永不再”乡	143
·东直门	147
·天体	150
·我的书房史	155
·我的年轮	159
·我这两辈子	162
·岁末自勉	171
·南柯噩梦	174
·东车站	182

鼓 声

在所有的乐器中，鼓同我这一生关系似乎更为密切。

倘若你闭上眼睛使劲回忆，总可以追想出自己孩提时代玩过的一两件玩具。我曾经这么试过。浮现在我眼帘里的，总是一只拨浪鼓，鼓面大约只有铜钱那么大，是否黄色的，两边各拴着一根红丝绳，绳端是颗透明或半透明的玻璃珠子，鼓槌是比筷子还细的竹棍，攥在手心里只要轻轻那么一摇撼，两颗珠子便甩动起来，拨浪拨浪地在鼓面上敲出细碎响声。拨浪鼓给我带来过无限快乐。它那清脆的声音曾冲破我儿时的孤寂。

四五岁上，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另一种鼓进入我的生活了。当时，北京有一种穿街走巷收购旧物的商贩。不同于一般的商贩，他们不是短打扮，往往身穿长褂，右肩上搭着条细长的钱口袋。那是他用以夺走穷人最后一点生活用品的资本。他一只手里握着个鼓槌，另一只拿的是比我幼时玩的那种大不了许多的小鼓，北京市民通称他们作“打鼓儿的”。

在我心坎上，“打鼓儿的”是一种文雅的强盗。每逢这种人进家门一趟，我们就少一件家具。“打鼓儿的”吆喊的是收买珍珠翡翠，玛瑙玉器，可我们那一带连见也没见过那种贵重物件。通常请“打鼓儿的”过目的，不是现由娃娃腕子上剥下的镯子，就是家里仅剩的一件木器——炕桌。“打鼓儿的”料到卖主都是些揭不开

锅的，走进来脸上照例是那副不屑一顾的神情，然后撇嘴摇头说：“值不得几个大，还是留着使吧。”经过卖主再三央求，他才丢下几吊钱，过不大多会儿，摔瓶呀，条案呀，就随着那清脆的鼓声永远地消失了。（1966年红8月至1970年秋天下干校的那段日子里，“打鼓儿的”好像又在生活中出现了，而且不是他来取。是卖主送上门去。一时卖主太多，又太急切了，站在委托商行柜台里的人把脸拉长，嘴撇了起来。见什么他都说声：“不要。”有个朋友好不容易借到一辆平板三轮，把上百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珍本书拉到旧书店了。柜台里的人说：“不要！”“可我怎么好再拉回去呢？五间房子只剩下一间啦。你随便给个价儿吧，给价儿就卖。”“你准卖？”“准卖。”“那好，我给你一毛钱。”一毛钱也卖了。因为那毕竟比再拉回去的沮丧还要好受些。）

我母亲“接三”的那个晚上，鼓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更为可怕的阴影。大概是为了体面吧，家里请来一台由两三个和尚组成的“焰口”。我作为“孝子”，跪在灵旁。也不知道他们诵的是什么经，反正咚咚嚓嚓闹腾了一宵。我又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条板凳上，扒着棺材沿儿同母亲告了别。然后，棺材上了盖，斧头就把它钉死了。

多年来，鼓声给我带来的是棺材、和尚和死亡的影子。

鼓声再度出现在生活中，是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腰鼓队走过天安门时，我才体会到鼓声的雄壮，鼓声的优美。多少世纪以来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还有什么乐器比鼓更能表达人们的喜悦，更能表现出一个重生的民族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呢？成千的腰鼓队员排列着，整齐得像棋盘，个个头上用毛巾扎着麻花。咚——咚——咚咚咚。声音单调吗？一点也不觉得。因为

每一声咚咚都敲出对旧事物的诅咒，敲出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美好的祝愿。

接着，1950年的冬天，我在湖南岳阳县筲口乡又听见鼓声了。咚咚咚，一大堆浸着世代农民鲜血的地契燃着了。除了鼓，还有什么乐器更能表达从奴隶变成主人的狂喜呢！

然而六十年代中期，鼓声突然变了，变成对自己人的威胁。

1967年吧，我住在——更确切地说，是我被赶到一条小胡同里。隔壁住了一位老寡妇，她身边只有个独子。他们仿佛也是经抄家被赶到那里一间小东屋的。听说学校的“文革小组”勒令那个独子到边远地区插队。老寡妇舍不得让他走。于是，每天中午就从居委会那边咚咚咚地敲起鼓来，越敲越近。敲到寡妇门前，鼓点更紧了，而且堵着寡妇门口一敲就是几十分钟。鼓声里充满了杀气，好像有千军万马在包围。老寡妇由于怕四邻每天都得陪着受罪，最终还是咬牙让孩子走了。

那阵子，什么单位大约都不乏一些年轻力壮的鼓手。手持双槌，蹦蹦，真是耀武扬威。鼓越做越大。先是威风凛凛地站在平板三轮上敲，“九大”时就上了彩车。

那阵子，三天两头就得跟在鼓后面游行。有时是为了庆祝一些来路不明的“最高指示”，有时是为了“报喜”。那时鼓声起的是窒息大脑的作用，然而有时候脑子偏偏还喜欢动那么一下。“出版史上的奇迹：三天之内赶印出两本书来！”当整个民族文化都瘫痪了时，这报的算是什么“喜”呢！

然而生活在达摩克利斯的剑刃下，脑子的闸门可得拧紧呀！生命就靠那拧紧的功夫来维系。

这三四年，鼓声不那么频繁了。鼓还是要敲的。管弦乐队、铜

管乐队都少不了它,重大庆典也还是要敲锣打鼓的。那属于鼓的正常使用。然而鼓声不再是杀气腾腾的了,它不再对自己人显示威风。这真是大好事。有时候我也暗自担心,那些年轻鼓手会不会不甘寂寞、会不会手痒呢?

今天,国家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锣鼓喧天。一场旷日持久的动乱之后,它需要的是埋头苦干、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主义修篱补墙,添砖添瓦。让马达和电子的声音压倒鼓声吧!恰当地、有节制地使用,鼓声可以振奋人心;滥用,响过了头,鼓声的作用照样也可以走向反面。

1981 年 7 月

终身大事

一、宿命

男女结合历来是神话的大好题材。读过古罗马神话，看过西欧古典绘画的，大概都记得那个背上长了一对翅膀、手执弓箭的胖小子。他叫丘比特，乃维纳斯的令郎。这位小爱神往往蒙着眼睛举弓乱射。世间少男少女的心，只要经他那支箭射中，就天作良缘了。

幼年，在北京寺庙中间，我最感兴味的是东岳庙——如今成了公安学校。一般庙宇大同小异：一进山门总是哼哈二将，四大金刚八大怪；再往里走，大雄宝殿里不是乐观主义者大肚皮弥勒佛，就是满面春风的观世音。东岳庙可不然。它有十八狱，那实际上是阴曹地府的渣滓洞：有用尖刀血淋淋地割舌头的，有上刀山下火海的，不过那些泥塑的酷刑都旨在警世。也许为了对照，东边还有座九天宫，那座巨大木质建筑非常奇妙。我时常噤噤地盘着木梯直上云霄，飘飘然恍如成了仙。

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西北角上一个小跨院，那里供着一位月下老人。少男少女只要给他用红头绳一系，就算佳偶天成。因此，这个小跨院（性质有点像婚姻介绍所）里的香火特别旺盛，不断有做父母的带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穿着新缝的长袍马褂，

整整齐齐，进了庙先在炉里烧上一炷香，然后跪在蒲团上，每作完一个揖，就毕恭毕敬地朝月下老人磕一个头。

跨院里照例拥有一簇看热闹起哄的。当男青年在虔诚地朝拜祷告时，他们就大声嚷：“磕吧，磕响点儿，老头儿赏你个美人儿！”也有恶作剧的，故意大煞风景地叫喊：“磕也白磕，反正你命里注定得来个麻媳妇儿！”

正因为有这帮子人捣乱，几乎就没有见过女青年来跨院里朝拜。有人说，她们来也赶大早或者傍晚，因为她们也需要月下老人的照顾。

于是，我心下就冒出个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男婚女嫁？有位长者捋了捋胡子，用一首北京儿歌回答了我：

小小儿子，坐门墩儿，哭哭咧咧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么呀？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明儿早晨给你梳小辫儿。

那是我最早接触的一份恋爱（或者说结婚）哲学。这种哲学不但以男性为中心，而且十足的实用主义。

二、浪 漫

我听过一位教授的英国文学史课。学期终了，一检查笔记，讲授的内容一半以上都是历代英国作家——尤其诗人们的恋爱史。温课的时候，禁不住要比较一下究竟是拜伦还是雪莱恋爱的次数多。

在西洋文学里，恋爱的确是作家们向来最热中的题目。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一剧里，写尽了青年男女在恋爱中的痴情、妒忌、执拗和盲目。月光下，在那扑朔迷离的小森林里，喜欢恶作

剧的小精灵迫克,就在仙王奥布朗的指使下,捉弄起少男少女。这里海誓山盟,那里越追越躲。及至东方破晓,才又恍然大悟。

“情人眼里出西施”。看来爱情是盲目的这个概念,也并非中国人所独有。

十八世纪英国诗坛大师威廉·布莱克认为爱情的奥秘在于只可神传不可言说。他有一首诗,三十年代译出后曾在我国传诵一时。我身在医院,手边既没有原文,更没有中译文。只记得头四行仿佛是这样:永莫试图诉说你的爱情,爱情是不可言说的;正如微风的吹拂,温煦地,无影无形地……

在许多欧洲作家眼中,爱情总是一种矛盾重重的东西。有的形容它作“甜蜜的折磨”,有的说是“傻子的智慧,智者的愚蠢”。烦恼,但又无可奈何,说是像“出疹子,一场人人都得经受的灾难”。中国也有“女难”之说,有人不胜惋惜地喟叹“英雄难过美人关”。但也有为女方抱不平的,所谓“痴心女子负心汉”。明代就有文人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壮举,来为忠实于爱情的姑娘大出一口气。

法国作曲家比才在著名歌剧《卡尔曼·哈巴涅拉舞曲》里,十分形象地概括了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的爱情:“爱情像一只自由的野鸟,没有人能把它驯养,去恳求它也无用。倘若它想拒绝的话,无论是威胁还是祈求,它都满不在意。”接着又唱道:“爱情是茨岗的孩子,它永远不理睬法律的约束。”“你以为已把这只鸟儿抓住,转瞬它又振翅飞去。爱情远逝了,你无限惆怅。当你已不再向往时,它又飞回你身边,围绕着你迅速盘旋。它似擒又纵,来而又往。”总之,不可捉摸就是了。

然而另外也有些人带了不屑的神情,把绝代佳人斥为“绣花

枕头一肚草”。他们所追求的显然是更为实际的东西。

三、实 际

朋友讲过一个只有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才会发生的事：据说有位臭名昭著的伪满大汉奸的外孙女，长得如花似玉，然而苦于身上背了个某某人的外孙女这么个无形的沉重包袱。由于貌美，追逐她的大有人在。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外形这笔资本，甩掉那个使她成天坐立不安的包袱。在追逐者中间，她挑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之子。她提的条件是：给我党籍军籍。她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只是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原来嫁了个难以容忍的浪荡子。她抱怨，她抗议，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终于闹翻了。她提出离婚，对方说，离就离。军党二籍也立即随着婚姻关系一道消失，她作了场不折不扣的黄粱梦。

另一个同样属于“人生小讽刺”的真实故事：一位刚满六旬的男人，有一次他的老伴儿患了重病。他琢磨：万一老伴儿病故，自己成为鳏夫，晚年既孤寂又无人照顾，岂不苦矣哉！于是，他就托中人先为他物色一名候补夫人。恰巧有位待嫁的寡妇，觉得条件合适，就欣然允诺。不料患病的太太还未去世，那位未雨绸缪的男人却因暴病先进了火化场。

有位英国文艺界的朋友，一个傍晚坐在壁炉前同我谈起一桩伤心事。他是个戏剧家，曾爱过一位女演员，并且同居了。他对女演员是一往情深。一天，女演员在枕畔对他说：以我适宜演的角色为主角，你给我写一出戏，我给你五年幸福。这位戏剧家并没接受这笔交易，他们分手了。

1966年8月,有位朋友像许多人一样,由于忍受不住凌辱和虐待,自尽了。他的爱人咬着牙活了下来,“四人帮”倒台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温暖又回来了,其中包括解决牛郎织女问题。这时,一个调到甘肃边远地区的科技人员就托人同那位孀居的女同志搞对象。她生活很空虚,所以马到成功。登完记,甘肃那位立刻就积极着手解决“两地”问题。新婚燕尔,领导特别关心。于是,他真的调回来了。可是调京手续刚办完,另外一种手续就开始了:他正式提出离婚。

男女结合确实有实际的一面,然而实际的性质各有不同。

当年比利时刚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时,我就由伦敦赶去采访。在布鲁塞尔街头,我遇到一位华侨——青田商人。他殷勤地要我去他家度复活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飘流在外的华侨生活多么艰苦,也领略到中国人民卓越的生存本领。除了青田石头,他们没有任何资本;语言又不通,竟然徒步由浙江而山东……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了西欧。他们那幢小楼住了三户青田人。从那位萍水相逢的主人的邻舍那里得知,他本来是个单身汉。一道从青田出来的另一对夫妇,男的前两年死了。没有二话,他就把大嫂接了过来,成为患难夫妻。

最近住医院听到一段美谈:一位患癌症的妇女临终前嘱咐她丈夫说,两个孩子还很小,我死之后,你可向这里某某护士求婚。他马上制止她,不许胡言乱语。不久,她离开人世,而且他也察觉由于自己不擅料理家务,孩子果然吃苦头。他记起已故妻子那段“胡言”,就冒昧地写信向那位护士求婚。回信说:“您夫人在病榻上早已一再向我恳求过了,她又对我保证您是位好脾气的丈夫。既承您不嫌弃,那么我就答应了。”